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

陈兵 邓子美著

1 / (50) / 2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陈兵著.—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1

ISBN 7-105-03773-3

I.二… II.陈… III.佛教－中国－现代
IV.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70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9.25 字数:400 千字
印数:5001—8000 册 定价:29.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前　　言

风雷激荡、惊心动魄的 20 世纪将成为历史，跨入 21 世纪的门坎之时，回顾一下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艰辛历程，以清澈的眼光作一番审视，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是创造新世纪辉煌前景的必要准备。就此而言，对百年来中国文化的主角之一、中国人精神支柱之一，在下一世纪的文化重建中极可能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佛教，作一理性的反思，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的工作。

我们不揣浅陋，自愿承担了这一任务。课题的提出，是国家教委“八五”社科规划项目，由四川大学宗教学所陈兵申报获准，邀约无锡轻工业大学社科系邓子美合作分担。这一课题所覆盖的近百年，是一个天翻地覆、电掣风驰的变革时代，中国佛教同中国社会、中国人民一起，历经崎岖艰险，其间变化之激烈复杂，事件之纷纭万状，实逾以往千秋。仅佛教文字资料之多，即超过以往全部大藏经，还有大量活材料需作实地调查。我们人少力微，资料不多，经费短缺，自知难以圆满完成任务，好在这一课题已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目前已有六七部专著出版，可以参考借鉴。

我们探讨这一课题，是从振兴华夏、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立场出发，从文化反思、文化重建的角度，以客观冷静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对百年佛教历程作出理性总结，勾提佛教在中西文化冲突融会中、在社会急剧变革中兴衰嬗变的来龙去脉，总结佛教

弘扬的正反两面经验，评估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揭露其存在的问题，探索其未来走向。为避免与同类著作重复，采取专题史论的方式，重在探究具现实意义、前瞻意义，而学界教界较少研讨的重点问题。由于时间和力量所限，在中国三大语系佛教中，我们仅以汉传佛教为主要考察对象，对藏传、南传二系佛教，只是附带涉及。我们希望这本不很成熟的史论，能对正确认识佛教，对政府部门有关佛教政策法令的制定，及佛教自身的建设，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目 录

绪论 社会剧变与佛教转型	(1)
一、从佛教在印度的绝迹到中国佛教的衰落.....	(1)
二、时代的挑战与佛教之积弊.....	(8)
三、复兴的机遇与传统的优势.....	(17)
四、在改革中回应，从厄难中复兴.....	(22)
 第一章 佛教教会社团的组建	(29)
一、清末僧团的衰朽.....	(29)
二、中华佛教总会与各地社团.....	(35)
三、中国佛教会及其“整理”	(43)
四、中国佛教协会与港、台佛教组织.....	(55)
五、世纪初的建僧构想与世纪末的现实.....	(63)
 第二章 佛教文教事业的开拓	(75)
一、清末佛教教育与文化传播手段的落后.....	(75)
二、各地刻经处与祇洹精舍的创建	(79)

三、以太虚为代表的僧伽办学理念及其实践	(83)
四、以欧阳渐为代表的居士办学理念与支那内学院	(99)
五、传统弘法手段之开新与新传媒之采用	(102)
六、承前启后：中国佛学院及“台湾佛学院”、华南佛学院	(107)
七、中国佛教教育长足发展和文化传媒多样化	(111)
第三章 佛教社会基础的调整	(121)
一、清末佛教的社会基础	(121)
二、佛教与工商业者	(126)
三、佛教与知识分子	(133)
四、佛教与青年	(139)
五、佛教与妇女	(146)
六、现代佛教的社会基础	(152)
第四章 佛教社会功能的转型	(158)
一、从“治心”到荐亡	(158)
二、从积德行善到服务社会	(163)
三、从传统伦理到东方“天职”观	(170)
四、从避世到超脱	(177)
五、从怀旧思古到融洽情感，启迪智慧，丰富人生	(180)
六、从“三大救命环”到新功能的开发	(189)

第五章 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与运作	(196)
一、太虚及其追随者的人间佛教理论与早期实践.....	(196)
二、印顺对太虚理论的修正与海峡彼岸人间佛教之发扬.....	(204)
三、赵朴初对“人间佛教”理论的解释及其运作.....	(212)
四、道并行而不悖.....	(217)
第六章 法相唯识学的复兴	(224)
一、法相唯识学及其重兴的机运.....	(224)
二、教界研习唯识的盛况.....	(230)
三、学界研讲唯识的风气.....	(242)
四、唯识义理的研究探讨.....	(249)
五、对西方文化的回应.....	(260)
第七章 禅宗的振作	(272)
一、遗范尚在，宗风犹存.....	(274)
二、桃继五宗的虚云和尚.....	(281)
三、来果、月溪、圆瑛.....	(291)
四、居士禅的兴起.....	(299)
五、百年禅史的总结.....	(310)
第八章 净土信仰的高扬	(315)
一、近代自然观对净土的责难.....	(315)
二、净土信仰的相对优势与净土宗人之社会贡献.....	(318)
三、净土道场之典范与遍布全国的念佛团体.....	(324)
四、西方净土教义之系统化与规范化.....	(328)

五、净土信仰资源的新开掘.....	(334)
六、净土为归.....	(341)
第九章 求法新潮与密教热.....	(347)
一、东瀛求法与唐密之回归.....	(348)
二、藏教热及藏传佛教的影响.....	(355)
三、密教热的反思.....	(365)
四、南行求法及南传佛教的影响.....	(374)
五、中国佛教走向世界.....	(377)
第十章 天台、华严、南山律的传统.....	(382)
一、清末天台、华严、南山律概况.....	(382)
二、台宗弘传四方.....	(387)
三、华严教理之阐扬.....	(394)
四、南山律法幢东移.....	(399)
五、天台、华严、南山律振兴的前瞻.....	(406)
第十一章 佛学与科学之融通.....	(410)
一、“佛法是科学”之论证	(410)
二、对“佛法是科学论”的批判.....	(420)
三、对科技弊病的批判.....	(427)
第十二章 佛学研究的成果与方法.....	(434)
一、佛学研究的历程、阵容、机构.....	(435)
二、佛教史的研究编写.....	(443)
三、佛教思想、思想史的研究.....	(447)

四、佛教文献、制度、文化等的研究.....	(452)
五、佛学研究方法论.....	(457)
结语：21世纪中国佛教之展望	(466)
附 录 1：20世纪中国佛教大事纪	(476)
附 录 2：20世纪中国佛教主要研究论著目录	(598)
后记：	(608)

绪论：社会剧变与佛教转型

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在台湾省是向资本主义）的巨大变革，当今在大陆又经历着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不断变革中的世纪。社会剧变的汹涌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连续冲击着在长期封建社会中久已成型、业已衰迈不堪的佛教，向佛教提出种种挑战，使佛教几经挫折厄难，也推动了佛教的转型更新，使其赢得了复兴的机遇。

一、从佛教在印度的绝迹 到中国佛教的衰落

向称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创立于古印度百家争鸣、宗教勃兴的时代，它的出现，本质上是对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古婆罗门教的革命。佛教高扬“诸法无我”的理性大旗，公开反对婆罗门教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信条及依据婆罗门教神话而建立的种姓制度，主张“自净其心”，靠如实观察宇宙

人生的智慧解脱生死苦恼，颇具西方学者所谓“人文主义宗教”的色彩。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以一神崇拜为根本信仰的宗教不同，佛教以“法”为信仰的根本，“法”据称是教祖释迦牟尼以禅定中证得的超越性智慧所洞见的宇宙人生的真理。以教祖为楷模，依教祖所示“法”修行而臻永恒幸福的“涅槃”，被佛教悬为信仰之鹄的。无论从教祖的出身学养看，还是从教义的理论性、思想深度看，佛教都是一个文化品位甚高的、早熟的宗教，这决定了它必然超地域、时代，成为久传不绝的世界性宗教。而佛教冷峻、严肃、深刻的哲理性，超绝一切的出世间性，及以禁欲苦行的出家众“僧伽”为中心的传布方式，又局限了它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佛教向以“契理契机”为说法传教的根本原则。契理，谓符合佛法的根本理则；契机，谓必须适应时代、地域和不同根器爱好者的人众，所谓“应病与药”。这一原则，使佛教在印度能应社会的发展而变革自身，在约 1500 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原始佛教向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的 4 次嬗变，成为印度最重要的宗教之一，其昌盛适与印度史上最辉煌的王朝相一致。

公元 12 世纪，在回教军的扫荡排斥下，佛教在印度基本绝迹。像这样一个在十几个世纪里作为印度主要宗教并具很强应变性的世界性大宗教，竟然在它长期生长的故土灭绝，而与其长相共存的印度教、耆那教等虽同遭排斥压抑，仍然传续不绝，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和佛教徒深思的问题。回教军扫荡、失去当政者扶植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外因，然印度佛教本身，必有其不堪抗击外在力量摧残的内因，这大概主要有：1. 陈义过于高深，典籍过于繁多，理论经院化、学术化，教旨偏重出世，严格的修证标准非常人所能达到，核心宗旨难于深深打入多

数民众的心灵。2. 负住持佛法责任的出家僧团，在统治者供养下长期群体生活于大寺院里，或隐处山林修道，脱离民众，未能成为民众生活中不能离之的一类人。3. 其核心教义所具反印度民间传统信仰、反种姓制度的性质，使其不易深深扎根于印度文化而成为印度文化的主干。4. 立足于印度民间传统信仰的印度教复兴，吸收了佛教的不少内容，而佛教亦不断顺应、融摄印度教，因而丧失了在多元文化竞争中获胜的能力。总之，消踪故土，说明佛教未能融入印度民众的生活，这大概主要与佛教的文化品位过高，未能成功地创造出足以渗透印度文化深层的弘传模式相关。

佛教虽退出其故土，却在印度以外的广大地区传布不绝，蔚成大势。自公元1世纪起，佛教应请来到中国，经几百年的输入接纳、消化吸收，扎下深根，在中华文化深厚土壤的培育下开花结果，实现了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释道三足鼎立、三元共轭的文化结构中，其地位仅次于儒家。至公元7世纪，以在印度无遮大会上辩论获胜的玄奘归国为标志，世界大乘佛教的中心逐渐北移中土，并以中国为中心，向中国文化圈内的广大地域扩散。印度晚期成熟的以“密主显从”为特质的大乘佛教，从公元8世纪起翻越雪山屏障，传入中国西南边隅吐蕃，经过与当地苯教的斗争，获得全民信仰、政教合一的地位，并以西藏为中心向四方传播。阿底峡于11世纪中叶到吐蕃时，曾赞扬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已超过佛教的故乡印度。在世界三大语系佛教中，汉、藏两系都在中国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巴利语系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也流传于中国西南的傣族等少数民族中。中国，堪称佛教大国、佛教的第二故乡。

中国汉传佛教于隋唐臻于全盛，八宗竞秀，高僧如林，理论

高度成熟，创造了俗讲、变文等讲经方式和义邑、法社、香火社、莲社等团体机构，无尽藏院、无遮大会、悲田院、悲田养病坊等慈善设施。唐宋以来，佛教向中国社会和文化深层渗透，促成了宋明新儒学和宋元新道教的孕生。

在不断适应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进程中，在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宗法性封建社会和儒释道三教鼎立共轭的文化结构中，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表现出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质，其主要有：

(一) 教义高度华化、成熟化。以中国人特有的智慧，通过判教、诠释、立宗，对全体佛学进行了总结、整理、概括、发挥，表现出吞吐印度佛学的恢宏气度。天台、华严二宗的“一念三千”、“一心四法界十玄门”等理论，将印度大乘佛经中蕴含的圆妙哲理发挥臻于圆极，造佛教哲学之巅峰。禅宗、净土宗以简易切实的履践之道，高度浓缩了佛学精华，适应了国民心态，二宗互补，成为中唐以来中国佛教的主流。藏传宁玛派、格鲁派等总结全体佛学的智慧，不在汉传佛学之下。

(二) 在多元共轭文化结构中固定了角色。由于世俗的伦理教化主要由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来承担，养生炼体主要由道教来担负，佛教的分工，便主要是解决人们生死、出世间的终极追求、心灵解脱问题。佛管出世，儒管治世，成为宋代以来社会共认的分工，佛教界人士也颇持认许，宋孝宗“以佛治心、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之言，集中表达了中国社会对三家文化功能的界定。这使中国佛教具有浓重的出世色彩，这种出世精神由高僧的行径作楷模、示范，在中国人包括多数佛教徒看来，学佛，即是“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这虽是印度佛教的主体精神，但未必是全体精神。从《阿含经》看，原始佛教还有颇近于儒家世俗教

化的一面，并非一味离尘出世。中国佛教八宗尽管皆属大乘，都宣扬普度众生、利乐有情，但从主体精神及多数佛教徒尤其是僧尼的行为看，无疑有畸重个人解脱的浓重出世倾向，对世俗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群体的教化较少关心。因此一些日本学者和现代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的领袖太虚等说，中国佛教是“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畸重出世的倾向，决定了佛教在极重现实的物质生活、伦理生活的中华民族中，难于成为主导全社会价值取向的第一文化，只能居于起辅助“世教”作用的第二文化地位。中国佛教又有其适应本土信仰传统的非常世俗化的一面，如来佛、观音菩萨等被视为法力无边、慈悲广大，能满足人们求子嗣、求财、求平安吉祥等多种世俗愿望的救度神，为封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信仰，直到如今，在寺庙进香拜佛的善男信女中，多数人怀抱的还是求菩萨保佑满足世俗愿求的低层次信仰。明清以来，僧尼的职事更多趋向于应民间要求赶经忏做道场，超生度死。佛教融入中国传统的多神崇拜，在使它得以广泛流传，被比受三皈五戒的正式佛教徒多得多的广大民众所信仰的同时，也降低了文化品位，容易被无神论者目为迷信。

(三) 以高僧为中心的传布。高僧以其超尘离俗、刻苦精进的人格楷模和智慧、德行或神通吸引信众，成为信众的精神导师，佛教的代表。一个高僧门下往往有成千上万乃至数十百万的信徒崇拜，更多的庸僧、“粥饭僧”则实际充任庙祝巫觋的角色，以管理寺庙香火、做法事送终度亡为职事。僧团以封建庄园式的寺庙农业经济为主要生存基础，以信徒供养、香火经忏及农耕等收入为辅。

(四) 教权始终在王权统治之下。僧尼剃度、寺庙修建乃至大型法会等教务，由政府设立的监福曹、昭玄寺、崇玄使、左右

街功德使、宣政院、善世院、僧录司等机构管理，传教被严格控制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所谓“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使佛教的传布，对统治者有很大的依赖性，其兴衰系之于国主对佛教的好恶。由帝王之不好佛、反佛而酿成“三武一宗”破灭佛教的“法难”便是实例。

宋代以来，随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强化及儒学地位的不断升级，佛教传布模式在特定的文化格局中、在国家管理下定型，逐渐失去生机。外受儒者之“阴附阳挤”及各种民间秘密宗教、洋教之攘夺扰乱，内则锐气渐减，人才渐稀，思想学说无大发展，仅余禅、净二宗支撑门面，僧团腐败，戒纲不振，僧尼的社会地位逐渐降低。中国汉传佛教的衰落，大略显见于南宋末。元室尊藏传萨迦派为国教，汉传佛教受压抑，精神减退，人才凋零，并与民间信仰结合，分化出白莲教等非正统宗教。受藏传佛教影响，元代僧尼戒律松弛，至明初，僧尼俗化、不守戒行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在即帝位后曾下敕斥责当时僧道“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①又说：“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②下榜册订条款整顿，然未能严格执行。明世宗当政的40多年间（1522～1566），道教受宠，佛教遭受贬抑。至明末，佛教衰象多端。各地佛寺庙产，往往被豪强夺占，官府不予保护，僧风日败，“洒削卖浆”、“击鲜烹肥”、跪街乞钱、娶妻生儿者无不有之。万历四十二年（1614），朝鲜人李晔光游北京后所撰《芝峰类说》卷十八记曰：“中朝之僧持律者亦罕也。余赴京时，于圆通寺见僧皆蓄妻子，

① 《太祖实录》卷184，洪武二十四年敕。

② 《释氏稽古略》卷2。

与俗人无异。”万历十二年（1584），高僧德清（憨山）至山东崂山，当地人已不知有佛教，而“罗教”盛行。隆庆五年（1571），他至禅宗祖庭之一的江西青原山净居寺，“见寺废，僧皆蓄发”。后来至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广东曹溪宝林寺（南华寺），见“寺中百房，皆扃其户，入门绝无人迹，惟祖殿侍奉香火数僧，及住持方丈数辈而已。”僧徒则“种艺蓄养，与俗无异”。^① 寺产被劣豪流民所攘夺。至崇祯帝，对佛教贬抑更甚。当时名僧福州鼓山涌泉寺住持元贤作《田赋志》谓鼓山寺产万亩，遭豪强掠夺、海波荡吞，已失泰半，官府征用其六、其八，僧人“尽其岁之所敛，尚不足以完官，鞭笞既急，日夜惟豪家之镪是求”。趁佛教衰颓之机，西洋天主教士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等相继来华传教，打入上层社会，廷臣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等及永明王、崇祯帝、贞皇太后、皇后、皇子等皆受洗入教。到了清代，佛教衰颓之势更是万牛难挽。康熙帝曾御制诗感叹佛、道二教的衰微：“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于今究可哀！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材。”^② 兴盛千余年的大教，竟然成了文人墨客寄寓怀古幽情的点缀品，实属可悲之事。乾隆帝崇重理学，对佛道二教颇有冷落，二教的政治地位大大降低，式微之势有如江河日下。当时寺庙、僧尼，虽然数目尚不少，但因清廷废除了历代由官府控制通过考试剃度出家人的制度，大批无文化、无真信仰的流民和贫困破落者涌入僧尼队伍，藉佛谋食，使僧尼的素质和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清末的一本记述京华风物的书上竟然把僧尼道士女冠与蚤虱蚊蝇等并列为人间“十害”，反映了社会人士对僧

^① 《憨山大师年谱》。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 11。

道的反感。鸦片战争后，列强用炮火开路，强行输入基督教，而信奉上帝，视佛、道为魔鬼的太平天国，兵锋所至，无寺不焚，无佛不毁，江南佛教几遭全面覆灭。

二、时代的挑战与佛教之积弊

19世纪后半叶以来，佛教与中国封建社会一起，在列强的侵凌宰割下，经受了重重厄难。进入20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更为剧烈，社会变化更为急速，衰迈不堪的佛教，又面临新世纪的种种挑战。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佛教与整个中国传统文
化、东方文化所面临的最根本的挑战，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科技
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财富剧增，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节奏
日益加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科学文化开路，大大促进了历
史前进的速度，将古旧的东方远远甩在身后，向其社会制度、生
产方式及包括佛教在内的意识形态予以猛烈撞击。东方睡狮在列
强侵凌的重炮声中惊醒，急起直追，学习西方，迎头赶超。反帝
反封建，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摆脱贫困屈辱，以求
国强民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国人当务之急的共同目
标。佛教长期以来是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中古对大
唐盛世的形成起过积极作用，但近世以来与衰迈的封建生产关
系、封建文化紧密联结，容易被人们看作陈旧落伍的东西。传统
佛教畸重出世，忽视现实人生的建设，不能提供成功地改进社会
制度、促进生产发展的具体方案。虽然也有一些热心弘法者、儒家
文化的批判者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
太炎等倡导佛教救国救世，但多数民众对古老佛教能否真正救